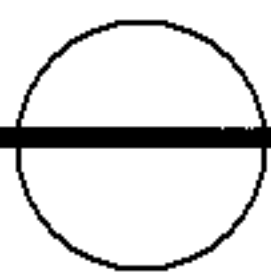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一年 3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一年第三期 目 录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5）

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

——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

.....北京大学 闻 军（18）

学习鲁迅 深入批修

——批判周扬一伙歪曲、诬蔑鲁迅的反动谬论

.....周建人（26）

“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35）

一个发展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彻底破产

——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反动实质

.....仲 智（47）



思想评论

在斗争实践中创建社会主义大学……………高 戈 (56)

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丛 学 (60)

克服轻视农业机具修配的错误思想……………伊继平 (65)

注意总结经验

认真总结经验 提高路线觉悟……………景 青 (69)

还原舞台 高手舞台

——我们是怎样把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的

……………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 (72)

怎样把斗、批、改不断引向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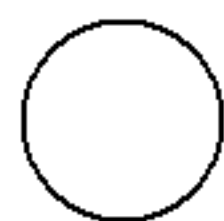
——吉林化工医院的调查报告…………… (81)

☆ 三月二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
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
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
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
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语录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语录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合二而一论”是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精辟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锐利武器。

光辉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深入传播，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一九六四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指使他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挑起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激烈论战。这是当时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了这场哲学战线上的重大原则斗争。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刘少奇、杨献珍的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展开了批判，使他们在一分为二革命辩证法面前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合二而一论”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它曾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史学领域中的“让步政策论”，文艺领域中



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以及杨献珍抛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都是“合二而一论”的具体表现。为了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的余毒，我们必须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杨献珍一类政治骗子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反动的“合二而一论”，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合二而一论”是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当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受到批判时，叛徒杨献珍无耻地狡辩说，搞出一个“合二而一论”，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当前的斗争形势”^①，是“随意抓来，胡乱使用”的^②。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早就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出卖灵魂的杨献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在刘少奇的指挥下跳出来，从哲学战线上向党发动进攻，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用“合二而一”的反动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

一九五二年，杨献珍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宣扬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合二而一”，为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涂上理论色彩。一九五八年，杨献珍别有用心地大叫大嚷要“利用矛盾的同一性”^③，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④，为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供哲学根据，对抗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紧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策划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时，杨献珍象条疯狗一样，东奔西跑，到处散布他的反动哲学，更加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杨献珍胡说什么对立的统一就是“共同点”，叫嚷什么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⑤，同现代修正主义只是“同中之异”^⑥，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



民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加强了对一分为二革命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论战，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反革命本性，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杨献珍煞费苦心地从明代封建文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找到了“合二而一”这个词儿，如获至宝，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在刘少奇的走狗林枫的扶持下，杨献珍在原高级党校的讲坛上公开贩卖“合二而一论”，暗地里还咬牙切齿地咒骂一分为二是“打人的哲学”。在杨献珍的授意下，他的门徒写成了宣扬“合二而一”的文章，由他修改定稿。一九六四年，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一阵反革命的紧锣密鼓声中，反动的“合二而一论”终于抛到了社会上。

列宁说过：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合二而一论”的出笼，在国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国内是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它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御用哲学，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杨献珍企图以什么“脱离政治”、“随意抓来，胡乱使用”之类的鬼话，来掩盖“合二而一论”反动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目的，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合二而一论”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拚命抹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叛徒杨献珍在贩卖反动的“合二而一论”时，正是采取了这种卑鄙的反革命伎俩。他竭力把“合二而一论”打扮成辩证法，胡说什么“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①。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的根本对立。

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



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毛主席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毛主席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思想，最深刻、最简明地概括了对立统一规律，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无论是自然界、社会或人们的思想，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而不是“合二而一”。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成其为人们的思想，也就没有世界。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过程的始终，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把一分为二的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承认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矛盾，充满着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只有坚持并运用这种观点，指导革命实践，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否认一分为二，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背叛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就必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那个“合”字，就是融合矛盾，取消斗争，反对革命，从而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把马克思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把社会主义“合”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里。这种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同一分为二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彻底驳掉杨献珍为维护这种反动世界观而制造的各种诡辩。



驳“共同要求”论

杨献珍喋喋不休地说什么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点”、“共同的东西”^⑧。他歪曲列宁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论断，胡说：“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要求”^⑨。

让我们来看一看伟大的列宁是怎样说的吧！

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请同志们注意：列宁在这里讲的矛盾的同一性，哪里有一丝一毫“共同点”、“共同要求”的影子？杨献珍胡说什么列宁所讲的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共同要求”，这完全是造谣诽谤。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精辟地解释了列宁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思想。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毛主席的教导，清楚地告诉我们：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依存。例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以同自己对立着的方面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而绝不容许象杨献珍那样歪曲为“共同要求”。难道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是因为有什么“共同要求”而互相依存的吗？当然不是。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无产阶级之间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但这也绝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的同一性。当我们谈到这种共同要求时，是把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一方，同以三大敌人为矛盾的另一方对立起来说的。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来说，他们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各自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矛盾着的双方不是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它们在



一定条件下还各向着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英勇奋斗，正是为了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例如，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转化为国家的主人，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三大敌人被彻底打倒。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叛徒杨献珍则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革命转化。他那种反动的“共同要求”论，说穿了，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让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永远骑在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

杨献珍从他反动的“共同要求”论出发，竭力抹杀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之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他说：“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还说：党内两条路线“都是走社会主义的”。^⑩把这话说明白点，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叛徒杨献珍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为彭德怀反党集团辩护，这并不奇怪。杨献珍本来就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干将。在我们党召开庐山会议之际，彭德怀在山上，杨献珍在山下，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地猖狂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似乎要把半个庐山轰倒。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揭露了彭德怀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杨献珍却为其鸣冤叫屈。一九六二年，他又和彭德怀互相勾结，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这就充分证明：杨献珍和彭德怀之间的的确确有“共同要求”，那就是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反革命真面目，击中了



他们的所谓“共同要求”论的要害。

驳“不可分离”论

杨献珍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对立面是“不可分离的联系”^①。他还胡说：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②。这是对唯物辩证法拙劣的篡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可分性。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内，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可分性来谈对立面的联系。对立面的斗争，必然引起相互联系的破裂，引起统一物的分解，使事物发生性质的变化。因此，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可分性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分的。客观事物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戳穿了形而上学者所谓事物不可分割的陈腐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就产生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老修正主义派别吗？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叛徒陈独秀、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在同这些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革命的“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促进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革命人民的团结，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进。杨献珍闭口不谈矛盾的斗争性和转化，根本否认事物的可分性，把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变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僵死的、没有矛盾的、没有转化的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杨献珍鼓吹“不可分离”论，有着极其阴险的政治目的。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的时候，他象牧师一样出来说教，说



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则两利，离则俱伤”^⑬。这同刘少奇鼓吹的反动的“剥削有功”论完全是一模所铸，充分暴露了这帮家伙都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正如毛主席一九五九年指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是“**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无产阶级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毒，**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实行彻底的分离。在这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中，怎么能“合二而一”呢？如果我们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杨献珍大肆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合”，不能“离”，正是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

驳“‘合二而一’的综合”论

杨献珍之流还胡说什么“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⑭。这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知的问题，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妄图割裂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用反动的形而上学偷换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分析和综合既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又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分析表明了统一体分裂为两个不同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就是通过对立面斗争，一方克服、战胜、消灭另一方，旧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旧事物的消灭和新事物的胜利。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综合就是一个“吃掉”一个。历史的发展方向，总是革命的“吃掉”反动的，正确的“吃掉”错误的，但这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曲折的斗争过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阶级战胜、“吃掉”反动阶级的历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剥削制度，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吃掉”。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的分析和综合，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来，就要求具体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分析，加以综合，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事情很清楚，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分析和综合，都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

分析和综合是紧密联系着的。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也有分析。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化学这门科学时所说的，“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自然辩证法》）杨献珍之流否认分析和综合的联系，说什么“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这同托洛茨基所宣扬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那种资产阶级二元论，完全是一路货色。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毛主席极其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分析和综合人类认识史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绝对肯定，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一分为二，批判其唯心论的外壳，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这种分析和综合，充分体现了他们一贯主张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主席在这里又一次深刻地指出了综合和分析的内部联系，以及离开了科学的分析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综合。毛主席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的这个任务，仍然有待于我们努力去完成。

我们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



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总结经验，就要分清正确和错误，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将实践中得来的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掌握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这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分为二的矛盾运动。有了这样的总结经验，我们就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不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这实质上是“合二而一论”的一种表现，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合二而一论”是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

“合二而一”的反动哲学是叛徒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什么新创造吗？不是！他们的“合二而一论”，只不过是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矛盾调和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死敌就公开鼓吹“调和矛盾”的反动理论。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⑮。杜林胡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⑯。第二国际的反动头目妄图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阶级合作”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考茨基就宣扬什么“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⑱。所有这些家伙都不过是历史上匆匆的过客，他们都分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之下，现出了丑恶的原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德波林之流跳出来疯狂反对列宁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要等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而矛盾的解决，就是“对立面的和解”^⑲。德波林的这一套“矛盾调和论”，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哲学表现。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判。德波林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发生极坏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深刻地批判了德波林的反动哲学。



但是，自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来，为了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公然复活和发展了德波林的反动哲学。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大喊大叫：“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②他们所豢养的有学位的奴仆们也应声而起，叫嚷：对立统一规律“过时了”，统一“成了社会进步经常起作用的源泉和动力”，等等。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套修正主义的叛徒哲学，叫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没有象这样受到攻击、歪曲和糟蹋。

正当这伙叛徒们在哲学战线上兴妖作怪，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逆流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反复强调了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再次深刻阐明了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给修正主义逆流以迎头痛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就会犯错误，就会在政治上堕落。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并且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

今天，反动的“矛盾调和论”，已经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强化法西斯专政、推行侵略政策、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的工具。他们大肆叫嚣什么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这就是妄图抹杀侵略和被侵略、剥削和被剥削、控制和被控制的区别，要“大家庭”中的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完全“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然而，反动的“矛盾调和论”，丝毫也救不了他们。辩证法的固有规律是不以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全世界人民和许多中、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他们一分为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历史告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条反唯物辩证法的黑



线。刘少奇、杨献珍之流的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就是这条黑线在中国的一个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在同这条黑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坚持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哲学基础。只有学好用好**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才能深刻理解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经过四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阶级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继续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形式会变化，阶级矛盾决不会消失；阶级敌人的手法会翻新，反动本性决不会改变。还应该看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得到解决。如果不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不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清理了阶级队伍，整顿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富于战斗力。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战胜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胜利。但是，如果认为从此我们的队伍就百分之百的纯了，不存在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完全的纯是没有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这些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全国解放以来，又出现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刘少奇反革命集团，但他们都没有能够搞垮我们的党。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



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路线，使我们的党更加巩固，更加壮大，进一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必然会背离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就必须认真读书，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真地、坚持地、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克服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和作风。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我们就能够分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抵制王明、刘少奇、杨献珍一类的政治骗子而不上他们的当，也就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中，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

- ① 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九六五年四月）。
- ② 杨献珍的书面检讨（一九六四年十月）。
- ③ 《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九五八年八月）。
- ④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 ⑤ 《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一九六二年一月）。
- ⑥⑪《哲学引言》（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 ⑦ 《“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 ⑧ 《整风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
- ⑨ 《认识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 ⑩ 《给新疆班讲课记录》（一九六二年五月）。
- ⑫ 《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一九六四年四月）。
- ⑬ 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讲课。
- ⑭ 黎明在一九六四年五月的一次讲课。
- ⑮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七三页。
- ⑯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第三十八、一一六页。
- ⑰ 考茨基：《国债的经济影响》（一九一五年四月）。
- ⑱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二卷（一九二七年）。
- ⑲ 德波林的“自我批评”。
- ⑳ 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是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保障》（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

——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
“国防文学”的反动性

北京大学 闻 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指引下，全国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有了一切，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丧失一切；路线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三十五年前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对于提高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周扬一伙说：“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①他们还说：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

“国防文学”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口号？它究竟是“保卫祖国的文学”，还是卖国文学？是“救亡文学”，还是汉奸文学？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还



是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是一个必须弄清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国防文学”是王明、刘少奇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次大搏斗。这场论战是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而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一再教导全党同志要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和独立自主原则；不但要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发展阵地。这是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思想。

王明、刘少奇等一伙叛徒，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完全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合二而一”。正是在这个时期，叛徒、特务周扬一伙抛出了“国防文学”口号，鼓吹“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②，是具有“全民族的性质”^③的文学。“国防文学”的黑旗一扯起，“国防音乐”、“国防电影”、“国防戏剧”等便接踵而来，喧嚣一时，好不热闹。而它们的共同理论基础，就是鼓吹反共卖国、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

为了给“国防文学”打气壮胆，叛徒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亲自出马，化名“莫



文华”，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④鼓吹“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⑤，大肆兜售投降主义黑货，充当了周扬一伙的黑后台。周扬之流得到了主子的直接撑腰，更加有恃无恐，按照主子王明、刘少奇的腔调，进一步鼓吹“国防文学的范围应当放得更广大”。⑥他们完全以国民党奴仆的身份，说什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⑦，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⑧。这无疑是在公开拍卖无产阶级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

难道不应当提出领导权问题吗？不对！无产阶级“**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且牢牢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共同”、“一致”可言。毛主席明确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周扬之流鼓吹所谓“共同负责”，不要无产阶级“去要求领导权”，其实玩弄的正是国民党“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反动把戏。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反之，模糊了党的立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毛主席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王明、刘少奇以及周扬一伙，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就是跟随蒋介石一同去反共卖国，而使抗战失败。无产阶级如果依了他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和周扬的“全民”牌“国防文学”口号相反，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家应当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的这些话，打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是对“国防文学”的有力批判。



“国防文学”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国防文学”炮制者既然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必然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鹰犬和走卒。这是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反动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政权。在文化上，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反革命的“剿共”政策，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为“限共”、“溶共”政策。周扬一伙在三十年代以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参加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九三六年以后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为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效劳，成了资产阶级顽固派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周扬们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实际上也就是企图实现文化上的资产阶级独裁。国民党反动派歇斯底里地叫嚣所谓“停止阶级斗争”，要“共产党投降”，“收起共产主义”，周扬之流就下令“普洛（按：即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⑨，“‘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迹敛了”^⑩，并声称“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的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⑪。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徽章”应该摘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丢掉。请问，那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地位，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不正是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吗？周扬之流，就是企图通过“国防文学”，剥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战斗的权利，把文学限制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许可和满意的范围之内。你不同意吗？那你就是“宗派主义”，这完全是一副反革命专制主义的帮凶嘴脸。周扬们口口声声“国防文学”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说穿了，这个“大多数”不过是周扬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周扬们所担惊受怕的不是别的，就是怕“吓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怕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权。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推行“一个主义”，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新民主主义论》）周扬之流鼓吹“国防文学”，为资产阶



级文化专制主义摇旗呐喊，丝毫也不能阻挡革命的前进，丝毫也无法挽救国民党反动派必然覆灭的命运。

“国防文学”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一再宣扬题材要广泛，不是“国防”的也要写；一再鼓吹“创作自由”，而且“这自由是无限的”。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颓废主义和叛徒哲学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充斥舞台、银幕。真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这样的“国防文学”，完全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化中国人民精神的法西斯宣传的工具。

拉开“国防文学”的幕布，让我们看一看在“国防文学”舞台上活动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吧！这里有：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并与八国联军头子私姘的汉奸妓女（夏衍《赛金花》）；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一退再退、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一群国民党兵痞（田汉《芦沟桥》）；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投降敌寇的无耻叛徒（阳翰笙《李秀成之死》）；从狗洞里爬出来，颓废、堕落，感到已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假革命分子（夏衍《上海屋檐下》）；等等。这就是“国防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这就是“国防文学”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国防文学”不是汉奸文学、卖国文学又是什么！周扬一伙正是用这样的“作品”作为投降敌人的见面礼的。

更恶毒的是，他们露骨地嚎叫着“国家至上”，颠倒历史，疯狂地吹捧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独夫民贼蒋介石。田汉的黑剧本《最后的胜利》，为蒋介石大唱赞歌。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四条汉子”拼命为蒋匪帮歌功颂德，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蒋家王朝走狗的丑恶面目而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国防文学”的炮制者们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必然攻击和污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主力军工人、农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在周扬之流的笔下，人民群众统统被写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阶级觉悟，丧失抗战斗志的“群氓”，他们或跟汉奸拉拉扯扯，或匍匐在地主脚下，或向国民党兵跪下请愿。但是历史是不容颠倒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如此自觉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的宣传工具，是因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等。鲁迅早就揭露，周扬之流是“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半夏小集》）；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样一伙“敌人所派遣”的别动队，死心塌地地利用文艺为国民党反共独裁统治服务，是毫不足怪的。田汉这条癞皮狗，不是从狗洞爬出，便写了“国防戏剧”《芦沟桥》，大肆歌颂国民党军队，歌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吗？阳翰笙不也是叛变投敌以后，写出了歌颂叛徒的剧本《李秀成之死》的吗？叛徒爱叛徒，奴才效主子。“四条汉子”之流早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国防文学”不过就是“国民党文学”的别名而已。关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供认不讳。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公开支持的反动刊物就说过：“‘国防文学’早经全国作家明显的或暗中默承认了”。⑫

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以“两个口号”论争为标志，体现在文艺界的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只是文艺问题的争论，它深刻地反映着党内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搏斗。在这场搏斗中，王明、刘少奇叛徒集团，上上下下几乎倾巢出动，他们或站在幕前，



或退居幕后，有时凶相毕露，有时貌似公允，不断变化手法，宣传他们的反动主张，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当鲁迅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周扬一伙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时候，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却叫嚷什么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浪费气力”，使人“失望”，应当立即“休战”，妄图转移这一场原则斗争的目标，为声名狼藉的“国防文学”大帮其忙。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论争既然挑起，这个“战”是万万“休”不得的。王明、刘少奇、周扬这类政治骗子，内外串通，干下的一桩桩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他们真想休战吗？否！就在他们高叫休战的时候，不正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进攻，公开宣战吗？他们把“国防文学”吹嘘成是“驳不倒”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污蔑成是“宗派主义”，这一褒一贬，他们的反动面目何等鲜明！他们不仅当时没有休战，就是解放后，不是还在不断地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吗？不是还在新形势下改变策略，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他们这伙混入革命阵营的蛀虫，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一有时机，就兴风作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休战的谎言。

一九五七年夏，周扬一伙主持下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名义上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和冯雪峰、艾青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借机攻击鲁迅，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周扬一伙的干将夏衍首先跳出来，煞有介事地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说成是“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愤愤不平地叫喊“我们几个人（按：指“四条汉子”）被诬陷了二十年”^⑬。他们肆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硬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⑭他们反攻倒算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紧接着，他们又通过《鲁迅全集》的一条颠倒黑白的注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那篇自我吹嘘的文章，以及一个吹捧这篇黑文的“座谈会”，使翻案活动达到了顶峰。从此，“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当作正确的口号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周扬们得意忘形了。几年来，又是拍电影，又是演戏剧，又是出“四条汉子”们的“专集”，又是编写《中国电影发展



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等等，极力复活“国防文学”，妄图以此来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抗。他们为“国防文学”翻案是何等地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又是何等地卖力啊！他们的目的就是颠倒历史，把他们一伙说成“一贯正确”，而掩盖其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以便维持他们窃取的领导权，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为“国防文学”翻案，就是为王明、刘少奇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为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周扬们的翻案复辟活动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一切剥削阶级连同他们在文化界的代理人，是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种反革命理论被打倒了，在一定气候下，还可能出来翻案；旧的毒草被铲除了，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改头换面，以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国防文学”及其鼓吹者周扬之流被打倒了，但是，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深入。我们对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斗争也决不能停止，决不能休战。我们一定要把贯串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彻底挖出来，并肃清其余毒。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批判“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而且要把“国防文学”的炮制者连同王明、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注：

- ① 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 ②⑪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 ③⑥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光明》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
- ④ 莫文华：《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生活日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
- ⑤ 莫文华：《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生活日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
- ⑦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一卷二号，一九三六年九月）。
- ⑧⑨ 徐懋庸给鲁迅的一封信（转引自《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百二十九页）。
- ⑩ 周扬：《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文学界》一卷三号，一九三六年八月）。
- ⑫ 《寒友》季刊，一九三七年第一期。
- ⑬ 夏衍：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
- ⑭ 陈荒煤：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



学习鲁迅 深入批修

——批判周扬一伙歪曲、诬蔑鲁迅的反动谬论

周 建 人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彻底揭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歪曲、诬蔑鲁迅的罪行，进一步批判他们的反动谬论，对于我们认识思想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仍然是很重要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中国思想文化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各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同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文化战线上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修正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用各种方法抹杀、贬低鲁迅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地位。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一贯仇视鲁迅，他们在鲁迅生前，妄图“吃”掉鲁迅；在鲁迅死后，又以“纪念”、“研究”为名，发表文章，举办展览，拍摄电影，干了一系列歪曲、诬蔑鲁迅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把鲁迅的一生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一生，胡说鲁迅的世界观与人道主义“一脉相通”，走的是“个人摸索奋斗”的道路。周扬一伙的种



种虚评妄说，都是为了否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鲁迅世界观的决定作用，从而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修正主义谬论必须进行深入的批判。

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并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

就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发表的第二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抛出了《精神界之战士》一文，公然同毛主席对鲁迅的英明论述相对抗。他以“分析”鲁迅的早期思想为名，在“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歪曲、诬蔑鲁迅。他胡说什么“鲁迅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市侩，主张个性，……这个观点在他整个的生活和艺术中演了重要的作用”^①；又说什么“自尊心（‘尊己’），顽强反抗性（‘所遇常抗’），绝不妥协的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这就是鲁迅所终生服膺而又身体力行了的拜伦主义的基本特点”^②。一句话，就是说鲁迅的一生是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

为工农大众还是为剥削阶级，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还是为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这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分界线。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鲁迅，和“个性解放”论者，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

鲁迅一生经历过多次的革命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聚合和分化。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鲁迅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思想越来越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特别可贵的是他越到晚年，革命意志越坚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忠。鲁迅“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③，拥护“无产阶级专政”^④。他认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



翼”^⑤。“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配合人民革命战争，率领左翼文艺战士，与三大敌人斗，与国民党的文化走狗斗，与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特务周扬等“四条汉子”斗，路线分明，立场坚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表达了他鲜明的阶级爱憎。鲁迅身处白区，心向苏区，写了《湘灵歌》、《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不少诗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所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当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病中的鲁迅兴奋异常，致电党中央，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这充分表达了鲁迅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切心情。

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年，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特务盯梢，叛徒告密，反动文人围攻的险恶处境，不怕压、不怕抓、不怕杀，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一定胜利。当托派匪徒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时，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那时，鲁迅身患重病，仍然坚持战斗。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逝世前的一天还在执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著名论文，就是他在病床上化了整整四天时间写成的。他在《黄花节的杂感》中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⑥正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决定了鲁迅在晚年越战斗越坚强。

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作为一个革命者，有一个好的开端并不难，难的是晚节有终。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的人有了一点成绩，就居功自恃，停顿起来；有的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却经不起糖弹的袭击；有的人怀着个人的野心参加革命，到时候就暴露出来。象鲁迅那样，越到晚年越显示出他的青春活力，越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鲁迅的“中心思想”与“个性解放”、“个性反抗”，毫无共同之处。“个性解放”和“个性反抗”，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切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个性解放”论者，一切以“我”为中心，凡是合乎个人私欲的就支持，就歌颂，否则，就反对，就暴露。“个性解放”论者的所谓个性反抗，不过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无限扩张，有很大的疯狂性和虚弱性。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个性解放”和“个性反抗”已经是极其反动、极其腐朽的东西。

周扬之流把“个性解放”说成是鲁迅“终生服膺”、“身体力行”的思想，决不仅仅是为了否定鲁迅，有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周扬在《精神界之战士》一文中，公然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也仍不失它巨大思想教育的意义”。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诱使我们去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性反抗”，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

周扬之流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鲁迅世界观的决定作用，还在于抹杀鲁迅思想的质变。他们把鲁迅早期的思想说成一生的思想，胡说鲁迅“主张锄强扶弱，主张解放人，是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正一脉相通”^⑦；又说鲁迅“所以是先驱者，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吸收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的影响”。^⑧这就是说，鲁迅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一脉相通”而来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真是荒谬透顶！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十月革命前，年轻的鲁迅，曾经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到过进化论等思想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鲁迅看见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目睹反革命的青年告密、



杀人丝毫不比反革命的壮年差。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促使他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正是由于这个根本转变，使鲁迅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的“斯基”、“大师”，而成为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正是由于这个根本转变，使鲁迅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具有坚决、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正是由于这个根本转变，使鲁迅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锐利的政治眼光，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能够识别和抵制王明、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坚定不移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十年代，鲁迅与周扬一伙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是最好的说明。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矛盾极度尖锐化，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在这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窃据“左联”党的领导的周扬，积极追随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当时，党内有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也破门而出，为之助威撑腰。文化界也有不少人随声附和。“一切为了国防”的叫喊，甚嚣尘上。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鲁迅砥柱触天立中流。他看穿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他在驳斥周扬一伙时说：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⑨他告诫人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抗日文化战线中的领导权，给了王明、周扬一伙的投降主义路线以沉重的打击。这充分反映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



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鲁迅后期的作品，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克服了前期文章中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片面性的缺点，表明他的思想进到了马克思主义化的高度。

鲁迅思想的根本转变，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是在同旧制度、旧文化的斗争中，特别是同人性论、人道主义、庸俗进化论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地批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①，“‘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②鲁迅还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③鲁迅的思想，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周扬否认鲁迅思想的质变，鼓吹“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正一脉相通”，是从根本上否定思想的阶级性，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根本否认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根“脉”，是资产阶级的脉，它的每一个细胞都带着阶级剥削的痕迹，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水火不相容。它只能通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决不可能通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从一个思想体系到另一个思想体系的转变，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只有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决不可能“和平过渡”。周扬宣扬人道主义和



共产主义“一脉相通”，实际上是反对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彻底改造世界观。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的统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还恶意歪曲鲁迅所走的革命道路，胡说什么“鲁迅的道路有他的特殊性”，是自己“摸索、奋斗”，^⑭“最后走上正确道路”^⑮。

鲁迅是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叛徒、特务周扬之流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是无法理解的。

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鲁迅的道路并不特殊。鲁迅的革命道路，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参加革命实践的统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是鲁迅锻炼成长的革命熔炉。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革命实践，他最反对“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⑯。他的全部革命实践，都同中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时期，鲁迅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向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作了英勇的斗争；大革命高潮时期，他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当时革命的中心地广州，积极组织文化队伍，开辟新的战线；土地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选择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作为战斗基地，披荆斩棘，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伟大导师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鲁迅重视革命实践，同样地也看重理论学习。一九二七年以后，他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刻苦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不管斗争多么紧张，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不好，他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在那种拿红皮书也要坐班房的反动统治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以内山书店一个职员的名义，租了一个房间，存放马、恩、列、斯的著作，经常带着斗争中的问题进行学习。他学习过的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列主义著作。在逝世前不久，他还说：“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⑰。鲁迅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想苦想。为了想透问题，他经常彻夜不眠。他主张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



活起来”^⑮。鲁迅善于正确处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攻击，都从正反两方面作为检点自己言行的镜子。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⑯。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的。

不学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火热的群众阶级斗争，就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宣扬“个人摸索奋斗”，否定革命实践对鲁迅的锤炼，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鲁迅的指导作用，归根到底，就是反对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世界观。

什么“个人摸索奋斗”！说穿了，就是叫我们不要学习理论，也不要参加革命实践，只要“钻故纸堆”，“啃洋本本”，搞“闭门修养”就行了。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实践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者，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否定理论作用的经验主义。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革命者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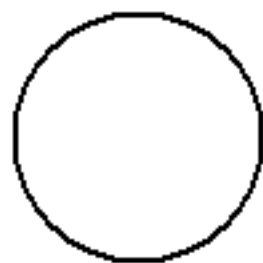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鲁迅同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斗争，以及鲁迅死后，周扬之流对鲁迅的攻击、诬蔑，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王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还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就是用什么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问题。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都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从而实现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然而，“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照妖镜来剖视，就



不难看出，周扬一伙鼓吹的所谓“个性解放”、“一脉相通”、“自我摸索”，同刘少奇的黑“修养”，以及现代修正主义鼓吹的什么“人类之爱”、“天伦之乐”等乌七八糟的东西一样，都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蛊惑人心的。他们以抽象的“人性”来否定思想的阶级性，把它说成是“人类的共性”，在思想领域里搞“合二而一”，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他们以抽象的“人性”，引导人们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问题，来推销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是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行动指南，妄图解除我们思想武装的惯用伎俩。

学习鲁迅战斗的一生，我们必须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认真读书，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学习鲁迅战斗的一生，我们一定要深入批修，进一步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反动观点，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 ①②⑦ 周扬：《精神界之战士》。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十三日。
- ③ 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十四页。
- ④ 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二九页。
- ⑤⑩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八五、一八二页。
- ⑥ 鲁迅：《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〇六页。
- ⑧ 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
- ⑨ 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五页。
- ⑩ 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八〇页。
- ⑪ 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九七页。
- ⑫⑬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四、一六五页。
- ⑭ 周扬和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十九日）。
- ⑮ 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 ⑯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四一页。
- ⑰ 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三五页。
- ⑱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三六二页。



“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军，曾经对长期流行于我国史学界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让步政策论”进行了批判。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切修正主义者，“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让步政策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它以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能够向农民“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谎言，竭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污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欺骗革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竭力鼓吹和支持反动的“让步政策论”，使之广为传播，充斥于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等许多部门。这个反动理论竭力吹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为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让步政策论”在旧文科的教学中，尤其有恶劣的影响。霸占文科讲坛的吴晗、翦伯赞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一直向广大青年学生灌输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论。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继续深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必须积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发出的“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伟大号召，对反动的“让步政策论”进行再批判。这种批判会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思想，推动文科特别是历史学中的教育革命更深入的发展。



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如同过去党内外修正主义者所散布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样，“让步政策论”也是剥削阶级用以腐蚀群众，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目的的一个工具。长期以来，它作为一种反动的世界观，起着歪曲历史、毒害人民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让步”论者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①还说，“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在“这一规律性的发展”中，“让步政策”“表现了”“社会历史的进步”。^②他们以大量的论述，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

在这里，“让步”论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到底什么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动摇以至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一部分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一些封建束缚。

农民起义，以直接剥夺地主土地的革命手段，多次遏制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民起义，还冲击着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农民军提出的“平等”、“平均”等革命口号，都是对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从精神上奴役农民的封建宗法思想的



宣战。

让我们重温一下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

太平天国代表了广大农民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意志，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歼灭了清王朝数以百万计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抗击了数以万计的英、美、法洋枪队，把反动派打得“呼救无从”，“魂梦屡惊”。太平天国镇压豪绅官吏，建立了和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天国集中反映了历代农民起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提出了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以实种作准，业户（地主）不得挂名收租”的明文规定，^③并发给农民“田凭”（土地证），“租田概作自产”，^④用法律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太平天国境内，出现了“谷物丰收”、“民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太平天国毁孔、关“圣庙”，禁孔、孟“妖书”，吓得曾国藩惊呼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成为近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列宁指出：“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这种时期，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十页）在封建社会中，正是农民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任何抹杀农民革命伟大作用的论调，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也就是按照一分为二的规律，不断斗争、不断发展的历史。

但是，“让步”论者却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千方百计为“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这个反动公式辩护，发表了一系列的奇谈怪论。

“让步”论者说：“唯有透过”封建统治者向农民让步的政策“来看每一个封建王朝初期的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才能够彻底理解”农民起义的作用。^⑤

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居然要“透过”地主阶级的政策才能表现出来，这是什么话！按照他们的反动观点，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一个（农民阶



级)，而是两个，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中，农民阶级又要“透过”地主阶级才能起作用，那就等于说，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对历史发展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使社会历史前进。这样，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即封建地主阶级。这就是“让步”论者的反动逻辑。人们“透过”这个反动逻辑，可以看到，几千年的历史被彻底颠倒了：一部以革命农民为主人公的封建社会史，被说成是“圣君”、“贤相”的历史，一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史，被说成是阶级合作的“让步政策”史。

“让步”论者说，革命的农民可以通过“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求”，^⑥或者说，农民可以“从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中收回一部分代价，保存一部分胜利果实”。^⑦

封建统治者究竟反映谁的愿望和要求？被“让步”论者捧上了天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对全国一万四千多户豪富，依次召至，个个授官，他反映哪个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岂不一清二楚？封建统治阶级强占农民的胜利果实，夺走农民从斗争中获得的粮食、土地，算是什么“保存”？农民的胜利果实“保存”到了地主手里，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还谈得到什么“收回”？只有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步”论者为了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肆意歪曲列宁关于“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的英明论断。他们把虚构的“让步政策”说成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并说：“历史上新王朝的改良、让步，不能不是作为推动封建社会动力的农民阶级斗争改变、改造当时黑暗统治的一个方面。”^⑧

列宁指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五十七页）列宁说得很明白，只有“革命斗争”，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改良”，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削弱和缓和”人民革命的“尝试”，而且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列宁还指出：“这样的改革总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列宁全集》第六卷，第四百六十四页）反动统治阶级的“改良”，反映了它的腐朽、反动和没落，反映了人民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让步”论者玩弄诡辩论的骗术，编造出新的封建王朝实行所谓“让步政策”，并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改变、改造当时黑暗统治的一个方面”，这恰恰证明他们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革命精神，成为修正主义的吹鼓手。

“让步”论者对于所谓“太平盛世”津津乐道。什么“人给家足”、“天下无穷人”啦，“外户不闭”啦，“民相遇者如亲”啦，等等。残酷剥削压迫的封建统治，被美化为充满了一派恬静安宁的景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殊死战斗，被描绘为“和谐”的图画；黑暗的封建社会，被粉饰成农民与地主共有的“人间天堂”。这是对历史的最卑劣的伪造。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何曾有过什么“太平盛世”！所谓“太平盛世”，无非是为了掩盖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欺骗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而制造的谎言。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十八页）这是历史的真正光明面。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剥削，引导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得到幸福的生活。鼓吹封建社会有什么“太平盛世”，只不过是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大颠倒！

“让步”论者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史学家一样，竭力攻击农民的革命斗争，狂热地吹捧封建统治阶级。他们虚构出“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这样一个反动公式，就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的。但是，由于他们披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手法，因此就有更大的欺骗性。

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让步政策论”者还鼓吹在每一次农民起义失败后，新的封建统治者能够采取什么“轻徭薄赋”、“奖励垦荒”、“招抚流亡”、“选用廉吏”、“减轻刑罚”等等措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⑨。

这是一个无耻的骗局。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封建统治阶级的任何政策，都是为了对农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



据自己的需要，变换其政策和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决不会变出什么“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来。

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者面临着新的阶级斗争形势：封建王朝对起义农民的大规模的屠杀，使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封建经济濒临崩溃；农民在起义中镇压了大批的地主分子，封建地主所有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封建统治的基础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封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尽速地组织其阶级力量，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基础，恢复封建生产关系，把封建剥削和奴役的枷锁重新套在农民头上。

“让步”论者把所谓“轻徭薄赋”吹得天花乱坠，难道真的有什么“轻徭薄赋”吗？他们吹嘘的最早施行所谓“轻徭薄赋”的汉王朝，规定皇族、官吏都有免赋免役的特权，地主、富商也可以买官爵、免赋役，而农民始终不在减免之列。他们赞不绝口的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非是把农民在起义时夺得的土地，以均田名义登记起来，变为官地，迫使农民交租服役，而对地主的土地，丝毫不触动。有的地区“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却要按五十亩甚至百亩的“均田”赋额纳租服役。革命农民在起义时，不交租，不服役；起义失败后，封建王朝重定赋役，强加到农民头上。这分明是农民新的苦难的开始，哪里有什么“轻徭”！哪里是什么“薄赋”！

所谓“奖励垦荒”、“招抚流亡”，又是什么货色呢？明王朝初期，就曾多次下令“募民垦荒”。在这个幌子下，大批土地被公、侯、大官、富民据为“私田”。贫苦农民开垦出来的土地，或成为“官田”，农民自身沦为“官家”的佃户、“屯田民”，甚至转为“军户”；或“成熟未几”，土地就被地主、豪强所霸占，农民被逼“转死沟壑”。而且，对贫苦农民，在“招抚”的同时，还伴随着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暴力。明王朝封建法律规定，凡是逃亡山泽的农民，如果不听官府“追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封建统治者为了扶植地主经济，巩固其阶级基础，就是以这样的残酷手段，来进一步绞杀农民革命，把农民重新束缚在封建的土地关系上。

总之，新的封建王朝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重新建立被农民革命冲垮了的封建秩序，恢复被农民革命削弱了的封建经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夺回他们在农民革命冲击下失去的一切。这些政策，对农民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反攻倒算，决不是什么“让步”。



“让步”论者为了说明封建统治者能够实行“让步政策”，制造了种种“理论”根据。

“论据”之一：农民革命“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迫使他向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⑩封建统治者可以自觉地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变或调整”^⑪。

反动派能够接受什么“教训”？列宁指出，“各个资产阶级的和地主的政府的全世界的经验创造了两种压制人民的方法”，即“暴力”和“欺骗”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十二页）中国末代反动王朝——蒋家王朝完全继承了这些“教训”。蒋介石对朱元璋的“宽猛相济，威德兼施”欣赏备至，作为“建国之借镜”。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反动统治者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并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实行反攻倒算，使农民进一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这种“教训”的结果。“让步”论者闭口不谈封建统治者赤裸裸的血腥镇压的一手，竭力称颂其麻痹、欺骗的反革命另一手，这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涂脂抹粉，掩盖他们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是什么呢？

至于说封建统治者能够自觉地调整剥削制度，更是无稽之谈。地主和农民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封建地主要维护和扩大对土地的占有，维护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农民则要冲决封建罗网，争取土地和人身自由。封建的剥削制度只有通过农民革命才能削弱和改变。试问：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哪一个封建王朝曾经自觉地调整过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即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才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剥削制度，分得了土地，并逐步地迅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康庄大道。所谓封建统治者能够自觉地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变或调整”的谬论，无非是要掩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罢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某些地方推行过的包庇地、富、反、坏的“和平土改”，同这种“让步政策论”正是一路货色。

“论据”之二：新的封建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让步”^⑫。农民战争之后，他们“不能不对农民作些让步”。而且，“反抗力大，让步就多”^⑬。

有剥削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



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革命构成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威胁。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革命力量的原则也始终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反革命策略，但其目的都是为着消灭农民的革命力量，直至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而决不可能有什么好心的“让步”。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横扫大江南北，雄据半壁江山，压了清王朝十四年，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清王朝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并没有对人民作过丝毫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出现了对反动派强大的革命压力。可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始终进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屠杀。现在，蒋匪帮仍然盘踞台湾，在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在什么时候对人民有过让步？

封建统治者在人民力量强大，自己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什么让步，那末，按照“让步”论者的说法，在农民起义已经失败，新的封建王朝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还会对农民实行“让步”，岂不是荒谬绝伦！

“让步”论者的种种所谓论据，无非是想说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力图给一切反动派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加上一顶顶什么“开明”、“现实”、“有远见”等等桂冠，在人民中间散布对反动派的幻想。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始终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行事的。几千年来封建王朝一个接着一个灭亡的事实，彻底地揭穿了“让步政策论”的骗局。

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合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



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

“让步政策论”的理论出发点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

“让步”论者认为，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地主和农民共同要求社会秩序的安定，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改善生活。

在阶级社会，决无抽象的“社会秩序”。地主阶级要求“社会秩序的安定”，就是要永远维护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则要求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烂封建社会的旧秩序，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让步”论者所谓的社会秩序的“安定”，正是要维护地主统治农民的旧秩序，反对农民革命的新秩序。

在阶级社会，也决无共同的“社会财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礎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因此，“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一页）。在封建社会里，所谓“社会财富”的“增加”，只能是地主阶级财富的增加，农民阶级的进一步被剥夺，只能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让步”论者宣扬什么共同的“社会财富”，暴露了他们充当剥削制度辩护士的丑恶嘴脸。

“让步”论者说，农民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同地主阶级的一致性^⑭，他们希望“变成富人、地主、官吏，爬进剥削阶级的圈子里去”，甚至“爬上皇帝宝座”^⑮等等。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八页）农民和地主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阶级本质和思想。“成为富人、地主、官吏”，甚至“爬上皇帝宝座”，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而决不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将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养活地主，还要向封建国家纳税服役，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实际上还是农奴。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迫切要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反抗剥削和压迫，而决不是其它。“让步”论者把地主阶级的本质和思想强加到农民头上，然后断言农民和地主的利益有“一致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莫大污蔑！



“让步”论者说，农民反对贵族、大地主和“腐朽”地主集团，这和一般地主、中小地主、“新兴”地主集团的要求有“一致性”，因此，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共同反对贵族、大地主、“腐朽”地主集团。

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作为被剥削被奴役的阶级，与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都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为了争夺奴役对象、剥削财物，为了争吵用什么办法巩固他们的统治，确是有矛盾的，有时甚至发生武装厮杀。但是，他们在剥削和压迫农民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农民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推翻封建的反动统治，而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地主阶级可能利用农民革命作为其改朝换代的工具，并进而扼杀农民革命，却决不可能象“让步”论者所鼓吹的那样与农民革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

“让步”论者鼓吹的这种“阶级合作论”，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理论，其实质是要革命人民去同反动统治阶级“一致”起来、“合作”起来，永远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地位。

这种“阶级合作”的理论，是一切反动派鼓吹的陈词滥调。

美帝国主义头子杜鲁门在欺骗工人的时候说过：“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工资优厚意味着有良好的市场。生意很好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和可以得到更好的工资。”^⑩

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早就宣扬过：“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主人穷了，奴隶也就要挨饿，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损失。”^⑪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为资本家辩护时说过：“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没有人剥削就完全没有饭吃，有人剥削，虽然吃个半饱，但这总是好一点”。^⑫

“让步”论者同他们的调子多么相似啊！

“让步”论者从地主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引伸出对抗阶级可以“和平合作”，进而抬出所谓“好皇帝”、“清官”作为对抗阶级“一致”和“合作”的体现者，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妄图从历史上“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

他们说，“好皇帝”、“清官”不只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还“实现了人民的



愿望和要求”^⑩，甚至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⑪。原来如此：现代修正主义者说现代有“全民国家”，“让步”论者也在中国古代“找到了”这种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揭示了国家政权的实质。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论人民民主专政》）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是干什么的呢？“**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百九十六页），是“**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它的一切法律制度、政策措施都是为了剥削和压迫农民的。“让步”论者把压迫说成是“保障”，把剥削说成是“让步”，把阶级专政说成是“阶级合作”，这就象列宁所痛斥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的脑袋浸透了“**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

把无产阶级的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学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让步政策论”者继承了封建的“正统”史学，继承了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鼓吹阶级投降主义的衣钵。他们所编造的“让步政策论”，正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同盟的产物。他们霸占史学阵地，利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争历史地位，就是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争主宰现实的地位；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是妄图拉着历史开倒车，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污蔑历史上的人民革命，就是诋毁当代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制造历史根据，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动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明确指出：要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这是无产阶级史学革命的根本任务。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逐步建立无产阶级新史学，使历史科学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那种不重视史学革命，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



度，认为“史学无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史学，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战争，都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着手研究一些典型的历史问题、人物、事件，解剖麻雀，取得经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史料，充满了阶级偏见，歪曲、颠倒了历史真相。无产阶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对史料进行认真的鉴别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无产阶级的新史学，必须古为今用。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旺盛的革命斗志、高度的政治敏感，洞察现实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新特点，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提出历史研究的新课题，紧密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广大工农兵编写“四史”，提供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当前，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运动，正猛烈地扫荡着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摧毁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个顽固堡垒。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应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投入革命的激流，认真改造世界观，成为史学革命的尖兵，把无产阶级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注：

- ①⑨ 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杂志第三卷，第十期。
- ②⑪ 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结论》。
- ③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
- ④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
- ⑤⑫⑬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第一六页、一一页、三四页。
- ⑥⑭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 ⑦ 严北溟：《对“让步政策”也要“一分为二”》。《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 ⑧ 《论改良、改革和让步》。《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 ⑩⑪ 吴晗：《朱元璋传》。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一二页、一七二页。
- ⑬ 《翦伯赞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⑭ 杜鲁门一九四六年国情咨文。
- ⑰ 考茨基：《国债的经济影响》。
- ⑱ 刘少奇：《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 ⑳ 翦伯赞：《评越剧〈则天皇帝〉》。《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三七一页。



一个发展资本主义 黑纲领的彻底破产

——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天津讲话》的反动实质

仲 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遵循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必须经常地、反复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好地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路线问题是革命的头等重要问题。我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取得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中国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在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深刻地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分析了民主革命获得基本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一个月，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便带着他的老婆王光美，匆匆忙忙地跑到天津，一头栽进了资本家的怀抱。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织厂职工、工商业资本家等讲



话二十多次，拼命地鼓吹“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疯狂地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维护人剥削人的制度，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这个臭名远扬的《天津讲话》，是他妄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对这个黑纲领，必须彻底进行批判。

鼓吹“剥削有功”，竭力维护剥削制度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通篇都是黑话，其中最反动的谬论就是所谓“剥削有功”。他胡说什么“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这是赤裸裸地为剥削阶级歌功颂德，妄图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刘少奇竭力鼓吹地主、资本家“剥削有功”，他所谓的“功”究竟是什么？

一曰“剥削是救人”，“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刘少奇这个谬论的实质，是说地主养活农民、资本家养活工人，没有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就无法生活。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剥削阶级翻案。

到底谁养活谁？到底剥削是“救人”还是吃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谁也颠倒不了的。那一间厂房不是工人盖？那一块田地不是农民开？地主、资本家都是一些吸血鬼、寄生虫，没有农民和工人的辛勤劳动，地主、资本家就一天也没法活。万恶的旧社会是豺狼当道、魔鬼横行的人间地狱，广大的工农劳动者在饥寒交迫中过着痛苦的生活。每一个工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每一个贫下中农都有一本苦情账。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的每块银币都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他们的每座工厂、矿山和庄园，都是建筑在工人、农民的累累白骨堆上。就拿天津“三条石”的三合成桅灯厂来说吧，这个仅有九十名工人的小厂，从一九三



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资本家的剥削折磨下，就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工人残废和死亡。剥削决不是“救人”，而是吃人、杀人。从天津“三条石”资本家的发家史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都是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农民的铁证。工人、农民痛苦的总根子就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对剥削制度的仇恨比山大、比海深。

刘少奇在抛出地主养活农民、资本家养活工人和“剥削是救人”的谬论时，在全国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和工厂中，正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在干部中正进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以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世界观。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刘少奇站在地主、资本家的立场上，颠倒历史事实，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模糊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意识，制造反革命舆论，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并妄图阻挡在全国范围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以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二曰剥削“增加了社会财富”。这是对历史的大颠倒。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旧社会，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和财富，绝大部分或全部为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占有。刘少奇说什么剥削“增加了社会财富”，地主、资本家的的确确是增加了财富。而地主、资本家所占有的财富越多，工人、农民受的压榨和剥削就越重，生活就越贫苦。刘少奇鼓吹靠剥削“增加社会财富”，就是要保持旧的生产关系，维护剥削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这就充分证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走狗。

三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有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就更快一些”，所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应该消灭”。按照刘少奇的这个谬论，靠剥削掠夺起家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帝国主义，岂不是早就应该进入社会主义了吗？这同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所鼓吹的，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又有什么两样？刘少奇拣起老修正主义这些奇谈怪论，其恶毒用心，就是要“更



快一些”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继续忍受压迫、剥削，不许无产阶级触动旧中国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刘少奇无耻地为资产阶级剥削捧场，就是要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破坏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妄想在中国搞资产阶级专政，千方百计维护将要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消灭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刘少奇的这个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在中国结束了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少奇这条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看到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即将崩溃，竟赤膊上阵鼓吹“剥削有功”，维护剥削制度，这是他反革命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反对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公然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的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叫嚷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要限制”，资本家“赚多少钱都合法”，“要保护资本家”，和资本家一唱一和地拼命鼓吹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资本家不满地说，国营企业限制他们的发展，“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刘少奇便立即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故还是不提限制为妙”，等中国工业生产达到“饱和了”、“过剩了”再限制一点。这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奴才的腔调。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能够允许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共同分配”吗？决不能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刘少奇所鼓吹的“平行发展”，实质就是只准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让它取代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国家经济命脉操纵在资产阶级手里。什么“饱和了”、“过剩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特征。到那时国营企业早就被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吞掉了，那还谈得上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限制！

资本家叫嚷国家收税多了。刘少奇便立即奴颜婢膝地回答：“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怎么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果然，刘少奇及其在财经部门的代理人薄一波，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和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商讨”以后，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炮制出了一个所谓“新税制”，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取消了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税收优待，免掉了大批批发商的营业税，增加了国营企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提高了私商的利润。“新税制”实行的时间虽短，但严重地损害了国营企业及合作社经济，为私商提高物价、投机倒把、加重剥削和与国营商业竞争提供了便利，冲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削弱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这个资产阶级的“新税制”出笼不久，就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痛斥，经过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尖锐斗争，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

刘少奇还声嘶力竭地呼号：“要发动工人保护资本家”，“不要把资本家挤垮，吃了母鸡，再不会有鸡蛋吃”，要“使资本家能有利可图，否则便是自杀政策”，“是‘三光政策’，是犯大罪，要影响全世界”。按照刘少奇的谬论，好象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就要“天诛地灭”一样。什么“自杀政策”，“三光政策”？这纯粹是从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垃圾堆里拣来的无耻调言，是对党的政策的恶毒诬蔑。

刘少奇对抗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和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资本家是新兴的，进步的”。谁都知道，旧中国由于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历史早已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刘少奇叫嚷资产阶级“年青”、“新兴”、“进步”，鼓吹在中国要先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等将来资本家从一个工厂发展到“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的时候，才能“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才能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这是在拣来的“唯生产力论”破烂上，贴上新的标签，用来对抗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妄图达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分析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性工业中的地位，以及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明确地指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指引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主席英明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在刘少奇的纵容和鼓动下，施放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抗拒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捣乱市场，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瓦解国营经济，泛滥资本主义。毛主席适



时地发动和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疯狂地诬蔑和抗拒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比憎恨和恐惧，充分证明他是钻进我们党的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暴露了他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妄图发展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如果让刘少奇的反革命阴谋得逞，资本主义就要大泛滥，国营企业就会被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所吞并，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逐步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继续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就要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反对依靠工人阶级，阴谋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靠的”，“中国工人阶级离开党是很久的”，如果依靠工人办工厂“一两个月就垮台了”。这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极其恶毒的诬蔑。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判了在城市斗争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依靠工人阶级，这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毛主席历来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我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直到今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进程都证明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更显示了它的伟大作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刘少奇反对依靠工



人阶级，否定工人阶级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作用，就是妄图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将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为了妄图达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刘少奇把工人阶级踩到了脚下，却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竭力主张要依靠资产阶级。胡说什么论“生产资本家第一”，“用共产党员办不好的事情，而用资本家办得好，那就用资本家”，不要“占着茅房不屙屎”。这是明目张胆地要共产党下台，让资本家上台，把政治、经济大权交给资产阶级。被刘少奇吹捧为“红色资本家”标杆的王光英，是一个“五毒”俱全反动透顶的家伙。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刘少奇的扶植下，先后窃据了二十多个职位。被这种人把持了权力的部门，不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了吗？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刘少奇在对天津市委负责干部的讲话时，却公然叫嚷什么：“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上，为资本家找利益”，要和资本家“搞在一起，一起看戏，一起扭秧歌，一起吃饭等。有什么事，和他们商量”。这是一副多么活龙活现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啊！他说站在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上是假的，为资本家找利益才是真的。刘少奇不仅拼命为资产阶级夺权，还公开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背叛无产阶级，蜕变成成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具。刘少奇让我们的党员干部和资本家“搞在一起”，就是要他们解除思想武装，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阶级敌人不是仍在不断地变换手法，施放糖衣炮弹，拉出去打进来，妄图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吗？这是多么值得深思和警惕的啊！

事实充分表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他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抛出的一株大毒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刘少奇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一个黑纲领，决不是偶然的，完全是由其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从混入党内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看到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即将崩溃，惶惶不可终日，明目张胆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剥削制度，妄图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他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次大暴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这次激烈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以后，又鼓吹“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叫嚷要“确保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他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已不是资本家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公然对工商联一个负责人宣称，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已“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一九六一年，他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相呼应，大肆鼓吹扩大自由市场，宣扬“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它“补了”社会主义的“缺陷”，让它再生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从刘少奇这一阵阵反革命的叫嚣里，看他妄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予了迎头痛击。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驳斥了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反动谬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多次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文献，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其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和揭露了在刘少奇支持下的彭德怀反党集团之后，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起了全面大反击，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同伙发展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思想评论

在斗争实践中创建社会主义大学

高 戈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许多高等学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导，有重点地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是高等学校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广大工农兵学员进校，加速了教育革命群众运动的前进步伐，使高等教育战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是对一切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彻底革命。在教育革命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的问题。招生开学以后，面临着大量繁重的工作和需要解决的种种矛盾，我们必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加强党的领导，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要有无产阶级革命到底的坚持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革命积极性，多方面集中群众的智慧，根据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及时总结，使教育革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肩负无产阶级的委托，以主人翁的姿态上大学，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中一支生气勃勃的突击力量。他们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广大工农兵学员牢记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伟大教导，把上大学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顽强学习。这些都显示了广大工农兵学员决心改造旧大学、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学的坚强意志。



对于教育战线上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如何充分发挥他们“上、管、改”的作用，使他们始终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大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应当看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在一部分学员中也有所反映，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对工农兵学员同样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路线教育，不断肃清“智育第一”、“理论至上”、“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的影响，使他们摆正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当革命动力与当革命对象的关系。

“上、管、改”是党和人民交给工农兵学员的光荣使命。“上、管、改”是密切联系的。只有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旧大学这块封、资、修的“世袭领地”，才能上好大学。那种单纯学知识、不问管与改的思想，是对文化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工农兵学员要立足本职，胸怀全局，上好大学，管理好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好大学，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作出贡献。这样，才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党的期望、无产阶级的期望，才能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本领。

为了胜利完成“上、管、改”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工农兵学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广大工农兵学员阶级出身好，政治觉悟比较高，经过三大革命斗争的锻炼，应当把这些当作继续革命的动力，而决不能陷入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果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在前进的道路上停步歇脚，就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旧大学有的工农学生，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个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反骄破满，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才能永远保持和发扬劳动人民的革命本色，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农兵学员要把这个方针，自觉地坚持地体现在自己的全部学习活动中。首先在政治上要有高标准，同时，在业务上也要严格要求，“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发



挥学习上的主动性，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熟练的技术技能。开学以来，许多工农兵学员为革命而学，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些文化基础较差的学员，也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排除万难，进步很快。事实说明，“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告诉我们：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正确的认识，则是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工农兵学员只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但政治上可以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不断得到改造和提高，而且完全可以比在一切旧大学更好更快地学到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学习上，畏难和急躁这两种思想，都不符合客观实际。我们要坚决反对“天才教育”、“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对学员学习中的具体困难，学校领导和教员要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关心他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学员之间要发扬阶级友爱，广泛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要善于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比较、鉴别的方法进行学习，搞好革命大批判。通过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努力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去批判一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的世界观对学生有着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所谓“教书不教人”，完全是欺人之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向广大教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员首先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更好地担负起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荣任务。

广大教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他们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前程，不少人焕发出蓬勃的革命朝气，积极投入教改实践，开始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有些同志在实践中遇到一些挫折，就认为“教改难搞，教员难当”，因而“怕”字当头，畏缩不前，坐等别人送经验，依赖领导拿方案，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广大革命教员应该坚定地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去掉“怕”字，狠斗资产阶级“私”字，和工农兵学员共同学习，并肩战斗，敢于挑重担，勇于闯新路，争当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



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不少教员严重“三脱离”，有些人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这些问题在教育革命中必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暴露了矛盾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要善于及时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和分析，通过革命大批判分清是非，肃清余毒，划清两种教育思想、两条教育路线的界限，帮助教员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路线觉悟。至于那些具体工作中的是非问题，要通过群众讨论和实践去逐步解决。采取简单急躁的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需要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因此，在加强三结合教师队伍建设中，必须对原有教师实行边改造、边使用、边提高的方针，充分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各级领导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教员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教改实践，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逐步适应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教学上要努力实行启发式，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要保证教员有必要的备课和学习时间，鼓励他们为革命深入钻研，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不敢使用原有教师，或只管使用而不抓紧他们的改造和提高，都是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大学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必须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和宣传队在领导教育革命中，要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坚定不移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广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职员工，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要以政治思想好带动其他三好，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保证足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很好地注意学员的身体健康，全面关心学员的成长。

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宣传队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建立适当的宣传队员轮换制度，保持骨干力量的相对稳定。对学校教育革命的各项工作要有全盘考虑。在调查研究、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并认真实施，经过实践检验，不断总结改进。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教育革命思想，认真总结文化教育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胜利完成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伟大历史使命。



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

丛 学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的指引下，机关、学校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响应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下乡上山，插队落户。同时，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五·七”干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两年来，“五·七”干校在政治上、思想上、生产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干部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进行“重新学习”，有力地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实践证明：办好“五·七”干校，并将校内的学习、劳动同插队相结合，是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之一，是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好形式之一。

现在，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走《五·七指示》指出的道路的自觉性，扫除某些思想障碍，把“五·七”干校办得更好。

有些同志对于办“五·七”干校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把它看作是一种临时措施。“五·七”干校是临时办还是长期办，是权宜之计还是百年大计？这两种思想、两种态度，反映了在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上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论是在“五·七”干校的干部，还是在职干部，都应该很好地认识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五·七”干校，是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发扬了“抗大”的革命传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艰苦创业；象《五·七指示》所教导的那样，“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从事农副业生产”，“从事群众工作”。这为广大干部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提供了非



常有利的条件。广大干部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处处有老师，事事触灵魂”，“一场战斗一堂课，一次总结一层楼”。一些过去“吃过小米扛过枪，住过窑洞开过荒”的老干部，经过在干校重新学习，焕发了革命的朝气；许多青年干部，在干校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立足点逐步移向工农兵这方面来。一些从干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干部，群众称赞他们“路线斗争觉悟高，联系群众好，能吃苦耐劳，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头人”。事实有力地说明，“五·七”干校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课堂，是斗私批修的好战场，是培养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好环境，是同工农相结合的好途径。一句话，它是干部思想革命化的大熔炉。

特别应该看到，办“五·七”干校，对于反修防修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干部，争夺接班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用“读书做官论”、“劳动惩罚论”和“三脱离”等修正主义黑货来腐蚀和毒害干部，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同工农兵相结合等一系列指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将干部引上“和平演变”的邪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毛主席英明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办“五·七”干校，使广大干部比较长期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重新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实践毛主席指示的这个“**带根本性的大事**”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保证。我们必须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办好“五·七”干校的重要性。现代修正主义恶毒地造谣诽谤“五·七”干校，正好说明了我们的“五·七”干校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就会感到，那种认为干校是临时安置干部的场所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尽管“五·七”干校有一定的安置干部的任务，但这不是它的主要方面。干校的根本任务，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用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提高广大干部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五·七指示》指出的道路，所有的干部都要走，全党、全军、全国都要走；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走，世世代代都要走下去。办“五·七”干校，不仅是为了重新教育不在职的干部，而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我们要通过办干校等形式，使干部下放劳动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克服临时观点，坚持不懈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下决心把“五·七”干校这个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干部的基地办好。

对于许多长期住城市、坐机关的同志来说，由机关到干校，由城市到农村，这是生活环境的一个大变化。绝大多数同志，都能适应这种变化，自觉地投身到艰苦的劳动中经受锻炼。但是，也有的同志存在怕苦怕累、认为在干校“不光彩”的思想，“一边干，一边盼”，希望早日分配工作，缺乏长期锻炼的准备。这种思想，也不利于“重新学习”，应当加以克服。

对于革命者来说，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艰苦的斗争，这是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最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能够使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培养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磨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增强反修防修的坚强意志。实践证明，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在艰苦的劳动和斗争中，最能触及灵魂，有许多事情要求你迅速地作出抉择，或者是冲上去，或者是退下来。这里，是无产阶级的“公”字与资产阶级的“私”字交锋的“二百米地段”，是改造世界观的好战场。因此，许多“五·七”干校有意识地把学员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重新学习、继续革命的必修课。简朴的生活，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劳动的汗水，冲掉了身上的资产阶级官气。这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大有好处的。“五·七”干校的同志们说得好：“长了老茧的手，能更高地举起革命红旗；踩了污泥的脚，能更坚定地走革命的路；能挑能担的肩，能更好地挑起革命的重担。”

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有的同志过去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毒害下，长期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追求舒适的生活，养成了“四体不勤”的懒汉作风，滋长了“官、暮、骄、娇”等不良习气。对于这些同志来说，尤



其需要艰苦斗争的锻炼。只有经受这种锻炼,才能医治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病毒,焕发出革命朝气,增强抵制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能力,在今后的工作和斗争中,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如果图舒服,怕困难,不愿意经受艰苦生活和斗争的考验,那就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相反地,会继续被它所腐蚀,其结果必然是舒舒服服地变修,最后吃大苦头。这是很值得警惕和值得深思的。

至于光彩不光彩,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刘少奇一伙从剥削阶级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世界观出发,大肆宣扬“读书做官论”和“劳动惩罚论”,他们不是把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看作革命,而是看作“做官”,用剥削阶级的这种反动世界观毒害干部的灵魂,使干部由普通劳动者、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办“五·七”干校,正是要彻底肃清刘少奇的这种流毒。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通过在干校学习和锻炼,肃清剥削阶级做官当老爷的恶习,保持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本色,成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工能农、能文能武的革命战士,这同做其他革命工作一样,是很光荣、很光彩的事情。相反地,如果沾染了剥削阶级追求“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恶习而不加改造,任其散发臭气,那才真正是很不光彩和低广大革命人民一等的。对于我们革命干部来说,“在职工作”和“下放劳动”,都是革命的需要;由“在职工作”到“下放劳动”,或者由“下放劳动”到“在职工作”,都是正常的变动,这种变动是会经常发生的。那种把“在职”看作“光彩”,把“下放”看作“不光彩”的思想,实质上还是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在作怪,需要进一步加以批判和肃清。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用较长的时间进行学习、经受锻炼,就是“安家落户”的一种形式。唯其时间比较长,效果也就可能比较大。我们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把在干校的锻炼看作是改造世界观的一个大战役,充分利用这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以期收到较大的效果。



“皮肤晒黑了，脸晒红了，思想改造差不多了，该‘毕业’了。”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同样是没有看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经过前一段的学习和锻炼，许多同志程度不同地有了进步，但是决不应该满足于这一得之功。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得如何，主要地是看思想感情变化了没有，也就是看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了没有，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不是什么“差不多”，而是“差得多”，不是什么该“毕业”，而应该说是刚“入学”。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完成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如果不求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不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尽管“皮肤晒黑了”，思想却不一定变红，仍然可能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兵格格不入。我们要批判刘少奇的“劳动镀金论”，克服“差不多”的自满思想，把已经取得的进步，看作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下决心经受长期的锻炼。

为了很好地改造世界观，许多干校的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的教导，采取以干校为基地，轮流插队等多种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劳动，当好“参谋”，帮助附近农村搞好革命和生产，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这些做法，不仅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使干校的同志得到了更好的锻炼，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为了收到思想革命化的更大效果，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干校的同志要更自觉地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种关门办校，单纯劳动的做法，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

“五·七”干校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创办起来的。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有阻力、有斗争。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是办好干校的根本问题。干校的斗、批、修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继续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一打三反”运动。在有的地方，资产阶级派性还要继续克服。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很好地总结前一段办校的经验，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把“五·七”干校作为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认真办好，长期办下去。



克服轻视农业机具修配的错误思想

伊 继 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正在迅速发展。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增加，农业机具的修配任务就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于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许多农机修造厂的广大工人，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制造与修配相结合的原则，在完成农业机具制造任务的同时，及时地完成修配任务，有力地促进了春耕备耕工作，为夺取今年农业的新丰收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的人仍然存在着重制造轻修配等错误思想，这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没有肃清的反映，应该加以克服。

有人认为：何必在破机具上打主意，修修配配太麻烦，干脆造新的倒省事。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们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一部农业机具，只要损坏一两个零部件，就会影响它的正常运转，不及时进行修理，就会白白地闲置起来。如果只图“省事”，使许多能够修配的机具随便报废，就会既给国家浪费大量钢材，又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了充分发挥每一部农业机具的作用，做到物尽其用，为国家节约资财，必须切实做好农业



机具的修配工作。这是实现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挖掘农业机具生产潜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修一台机具真的不如造一台省力气吗？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机具损坏的程度不同，修理的费用也各有不同，但是，修配总是局部性的，总的说来，修复一台机具不论在材料上、人力上都要比造一台节省得多，花钱少，见效快。当然，如果从单件修理与成批制造相比较，修配工作似乎“麻烦”一些。但是想到给国家节省钢材，想到贫下中农希望机器尽快投入生产的急切心情，我们多麻烦一点又算什么？这里关键问题是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方向明确了，就会千方百计地替贫下中农着想，什么“困难”，什么“麻烦”，都不在话下。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干革命，搞建设，就是要迎着困难上，不断解决“麻烦”和克服困难。搞农业机具的修配工作，尤其需要有这种精神。

山东省荣成县宁津公社修配厂，就是一个不怕“麻烦”，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先进单位。这个厂的工人，狠批了“支农吃亏论”，走出工厂，深入农村，一切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贫下中农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就是缺一个配件，他们也造。这从组织生产上来看，是比较“麻烦”的。但是，三年来，他们造出了四十多种、六千多件配件，修好了一百四十多台动力机械，使大批的农业机具能及时地投入生产，对保证农业的丰收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

也有人认为：制造是硬任务，非完成不可；修配是软任务，能做多少算多少。这种把农业机具的制造与修配对立起来，把修配任务当作额外负担的思想也是错误的。

修配和制造是使用生产工具中的一对矛盾。有制造，就必然要有修配。毛主席教导说：“**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矛盾论》）修配和制造也是这样，它们之间有着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密切关系，两者都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面，不可偏废。为了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必须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地加速制造各种类型的农业机具。但是，还必须看到，农业机具绝大部分是露天作业，和土壤及农作物打交



道,磨损和损坏比较快。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能光看制造的新机具多不多,还要看现有的机具转不转,为农业生产服务得好不好。就是说,不仅要看制造水平,而且要看修配能力。尽管生产的新机器再多,如果不经常维修,一坏就丢,那也等于无用。修配是制造的补充,是使用的延续。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只有搞好修配工作,才能使机器经常保持完好的技术状态,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而且,修配可以不仅限于恢复原有机具的性能,它还可以根据实践经验改进机具,加强某些容易损坏或不完全适合生产实践的薄弱环节,从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那种只造不修,认为修配可搞可不搞的“单打一”做法,虽然也不断增加了新机具,但由于正在使用的机具损坏了而不及时进行修配,新机具只能起到顶替作用。这不仅不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而且还给国家造成很大浪费。这种观点是必须纠正的。

河北省束鹿县,过去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些企业重制造轻修配,使农业机具大量失修。一九六三年仅排灌机械就报废了六百多台,占当时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三十,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县的许多工厂,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修造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加紧制造农业机具,努力增加品种;另一方面,又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加强修配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基本上建立了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了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这不仅使全县各种农业机具的完好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充分发挥了机具的效能,而且使脱粒、植保、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

为了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必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使修配力量与制造力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建立比较完整的农业机具修造网,坚持造中有修,修中有造,修造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具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还有的人说什么:“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赚钱不多,没有前途。”他们总觉得修配“吃亏”,制造“有利”。这是刘少奇“利润挂帅”的余毒没有肃清的表现。怎样



来衡量“吃亏”和“有利”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办任何事情都要为革命的根本利益着想，都要有全局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我们搞修配和制造，都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加速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必须从这个革命的全局出发，认真做好农业机具的制造和修配工作。修理工作，虽然是“修修补补”，从本单位来看可能没有多少赢利，但是把机具修理好了，支援了农业生产，巩固了工农联盟，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怎么能够说是没有“前途”呢？相反，如果不顾革命全局，只从是否赚钱来考虑问题，怎么有利就怎么干，一味追求所谓“高利润”的产品生产，就必然破坏国家计划，损害全局利益，甚至滑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农业机具的修配，需要大量的配件。如果忽视配件的生产和供应，也会影响农业机具的正常维修。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克服重主机轻配件的错误倾向。要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提倡不为名，不为利，一切为革命，一心为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要搞好社会主义协作，为革命甘当无名英雄，为革命当好配角。在这方面，上海合金轴承厂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深入了解农业生产的需要，除完成本厂的任务外，还主动地承担了贫下中农急需的喷油咀和齿轮等多种配件的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农业。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指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了加速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战略任务，我们必须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机具生产，有计划地加速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同时，一定要切切实实地做好现有农业机具的修配工作，积极支援当前的春耕生产，夺取今年农业的新丰收。



注意总结经验

认真总结经验 提高路线觉悟

景 青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全党正在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党的各级干部带着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这个主要课题，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个政治思想战线生气勃勃，形势大好，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

为了把这次学习运动更加引向深入，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认真总结经验，把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一步。

毛主席指出：“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关于工商业政策》）总结经验，主要是总结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经验，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执行得好有执行好的经验，应该坚持和发扬；执行得不好有执行不好的经验，应该改进和提高；犯错误有犯错误的经验，应该纠正和克服。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提高认识，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不断前进。

毛主席一贯重视总结经验，并把它看作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的重要途径。早在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就针对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深刻地指出，有些人所以“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



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并且向全党提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一次指示全党“要认真总结经验”，“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指明了方向。

总结经验，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好方法。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无论是成功的正面经验，还是犯错误的反面经验，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必须对这些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加以认真的总结，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使之“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变成我们行动的向导。总结经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实现能动的飞跃的过程。如果对经验教训不总结或者总结错了，就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就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以至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对于总结经验，我们也应当这样看，这样做。

在总结经验中，要认真读书，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武器，才能鉴别对或错，辨明是非，分清哪些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哪些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错误的，真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总结经验，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的问题。我们



必须一切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从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出发，去认真总结经验。

不破不立。在总结经验中，必须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不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在自己的头脑中深深扎根；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不能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事实证明：革命大批判开展得越深，把刘少奇那一套反动观点批得越透，总结经验就会搞得越好。离开革命大批判去总结经验，那是搞不好的。

在总结经验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揭发和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纠正的办法，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树立“**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精神，并且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学习和时局》）。坚持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里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度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联系和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本文是将北京市革委会的同志和青海省革委会的同志写的两篇文章合并成的）



还原舞台 高于舞台

——我们是怎样把革命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的

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

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驻我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经过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和我们的共同努力，摄制成功，同观众见面了。广大工农兵群众赞扬说：这部影片的胜利诞生，使我们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了银幕，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一个新的胜利，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个新的成果。

回顾这部影片摄制工作中所经历的复杂斗争，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己每前进一步，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指引我们战胜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结果。是江青同志带领我们实践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进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破资产阶级电影艺术之旧，立无产阶级电影艺术之新的结果。我们经过反复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摸索出一条把革命样板戏搬上银幕的路子。这条路子的基本经验，就是拍摄革命样板戏必须“还原舞台，高于舞台”。

什么叫“还原舞台，高于舞台”呢？我们在摄制《智取威虎山》的实践中体会到，所谓还原舞台，主要是忠实地还原样板戏的革命精神，还原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还原舞台演出的革命气氛，还原样板戏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成就；所谓高于舞台，就是运用电影艺术手段进一步塑造和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弥补在舞台演出条件下受到限制的不足部分，进行再创作。在这里，首先是还原舞台的问题。只有在还原舞台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高于舞台；也只有高于舞台，才能充分反映样板戏的革命精神，真正达到还原舞台的目的。



这个认识，我们是逐渐明确的。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强调电影和舞台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在结构、调度、节奏、布景、表演、化妆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认为要还原舞台就不能高于舞台，要高于舞台就不能还原舞台，很难把两者统一起来。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经过千锤百炼，从全剧到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都是精益求精，经过反复推敲。要把这样光彩夺目的革命样板戏摄制好，就必须吃透它的革命精神和艺术成就，运用电影手段准确、鲜明、生动地体现出来，这本身也就要求把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统一起来。对于革命样板戏中始终让工农兵的高大形象统治舞台的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推陈出新的艺术成就，我们都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样，才能明确突出什么，选择什么，才能运用电影手段把样板戏的革命精神表现出来，真正做到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第八场，杨子荣在发现敌人密布岗哨的情况时，有一句“为什么忽然间增哨加岗情况异常”的唱词。开始，我们是用全景拍摄的，想通过他的身段反映他的内心活动，没有去突出他的面部表情；而这时他的面部表情，恰恰最能反映这位侦察英雄洞察环境、机警判断的特有素质，应该把镜头推进，加以突出。相反地，在第九场小常宝请战以前，听到民兵的操练声，她焦急地唱道：“看他们斗志昂为剿匪练兵忙，急得我如同烈火燃胸膛！”对这段戏，最初我们是把镜头推成中近景，想通过她的面部表情把她“坚决要求上战场”的急切心情表现出来，但却放过了小常宝一个有力的跺脚动作；而这个动作，正是原舞台为了表现她杀豺狼讨血债的决心而精心设计的。类似的情况告诉我们，能不能吃透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对于能不能达到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的目的，关系极大。

为了达到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的目的，我们除了保持原剧结构、情节和分场分幕的完整性以外，还在舞台演出感、布景等各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在舞台上，演员之间的交流必须保证所有观众都能听得清、看得见，因此他们的演唱大部分是面向观众的。为了保持舞台表演的这种特点，造成观众在剧场看戏的感觉（即所谓舞台演出感），我们在拍摄时就以舞台正面的观众角度为主，两侧为辅。但由于采用了镜头的运动、角度的变化和景别的选择等手段，又做到



了在保持舞台调度和舞台演出感的同时，丰富画面的层次和造成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的效果。第四场杨子荣审栾平的一段戏，当栾平供认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处的时候，我们就利用镜头的角度，把栾平处理到后景，显得很渺小，使处于前景的杨子荣显得更加高大、突出。在布景设计上，我们根据每场戏特定的环境，在舞台景的两侧合理地进行加工和延伸，代替舞台上的侧幕条。这样，既还原了舞台布景的主体形象，又增强了环境气氛，满足摄影角度变化对背景的要求。

在布景的制作上，为了避免单片景在银幕上容易产生的虚假的效果，我们又根据电影的要求把舞台的单片景分别改制成立体景或半立体景，并且把前景和后景、演区地面的颜色和背景、立体景和绘画背景衔接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加强环境的真实感。在追剿队滑雪舞蹈的场景中，我们还在原舞台布景的基础上，根据时间的变化和情节的发展，做了几次局部加工：一次是把演区地面向后方适当延伸、加高，为追剿队的滑雪舞蹈造成从远远的地平线上急速而来的感觉；一次是加了一个陡坡，造成追剿队已经登上山巅的感觉；等等。这种做法，既保持了这一场舞台布景的完整性，又为追剿队上山、下坡、攀悬崖等舞蹈动作提供了不同的环境气氛，体现了时间、地点的变化。对《智取威虎山》的幕间音乐，我们还采取拍摄展示环境的空镜头的办法去加以体现。这样，既可以保持幕间音乐的完整性，又为这些幕间音乐提供了视觉形象，避免了由于多次落幕在电影中给观众造成的等景、等戏的空白感。

毛主席教导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我们根据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对有关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分析，认识到其中最主要、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这方面，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要还原舞台和高于舞台，完成把《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的光荣任务，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各种手段，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更加突出，更加完美。



为了塑造好杨子荣这个全剧的主要英雄形象，我们在摄制工作中的体会是：

第一，努力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杨子荣这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对毛主席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对人民无限热爱，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充满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些最本质的因素，舞台演出中主要是通过为他设计的成套唱腔抒发出来的，但在银幕上如何处理这些成套唱腔，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却是我们摄制工作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过去拍戏曲片的唱段，大都是采用那种既没有特写、又很少用远景的“二半吊子”镜头，由于镜头很长而又很少运动和变换角度、景别，拍出来的片子虽然唱段是连贯的，但画面却显得单调、死板。这次在拍摄杨子荣的大唱段时，一开始我们虽然摒弃了那种拍法，却又把镜头分切得很多很多。因为镜头分得太碎，破坏了唱段的连贯性，损害了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

经过这个曲折，我们认识到，要突出杨子荣的革命激情，把大段成套唱腔拍摄好，必须同时达到两个要求：（1）保持唱段的连贯性，不能把镜头分切过碎；（2）细腻地表现人物的表情和身段，不能用那种死板的“二半吊子”镜头。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在拍摄《迎来春色换人间》的唱段时，就采用长镜头的拍摄方法，保证这个大唱段的连贯性，给人造成一气呵成的感觉；同时，又采用镜头运动的办法，尽可能地去展现主要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当杨子荣唱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上场时，用大全景表现他在阳光照射的林海中策马驰骋的英雄气势；唱到“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时，把镜头推成近景，表现他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革命理想；唱到“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时，把镜头下降，表现他气吞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等等。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我们在录音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过去拍戏曲片一般都采用先期录音的做法，唱和演是分离的，不利于抒发人物的激情。我们突破了这个框框，克服了拍摄现场容易影响音质，唱腔同画面上的口形不易协调的困难，把先期录音、同期录音和后期录音结合起来，保证了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能够较好地得到表现和突出。

第二，努力表现主要英雄人物压倒阶级敌人的英雄气概。杨子荣直接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戏，舞台上处理得很好，始终让英雄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但电



影和舞台不同，由于镜头的分切、角度和景别的变化，要在每一个画面上都造成英雄人物压倒阶级敌人的气势，并不是很容易的，搞不好就可能产生正不压邪的结果。我们在拍摄杨子荣只身打入匪窟这场戏时，对于杨子荣的出场，最初就设计过两个方案：一个是先出现威虎厅阴森的洞壁，随着镜头的运动，逐步摇出匪徒们手持短枪匕首向洞口方向凶恶注视的画面，然后杨子荣才上场；一个是杨子荣走进威虎厅洞口，随着他“任凭那座山雕凶焰万丈”的唱词，银幕上出现了座山雕等匪徒们凶相毕露的镜头。这两个方案产生的结果，都是正不压邪。现在我们的拍摄方法，是在用大全景粗略地反映了一下威虎厅的全貌之后，很快地就是杨子荣随着一道强光闪进画面，紧接着跳成特写，细致地去表现他藐视群匪、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而有意地省略了众匪徒张牙舞爪的凶相的镜头。在拍摄杨子荣战胜座山雕等匪徒盘问、威逼的戏时，我们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一方面用近景镜头来充分地表现英雄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用全景或画外音等手段把敌人始终处理在陪衬的地位上。但是，杨子荣既然是同座山雕等匪徒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么英雄同敌人就总会在同一个画面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现杨子荣压倒群匪的气概，我们便想方设法地让英雄处在最突出的画面位置上、最好的光线下和最好的背景前。当英雄同敌人作斗争位置变化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采取跟镜头的办法，使杨子荣靠近镜头，造成我大敌小的效果。当英雄处于后景、敌人处于前景的时候，我们总是使杨子荣处在画面视点的中心，而把敌人处理到画面的次要位置上。同时，我们学习了舞台上人物分色追光的经验，对英雄和敌人分别采用明与暗两种不同的光线和暖与冷两种不同的色调，并用轮廓光和眼神光使杨子荣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我们还根据威虎厅这个特定的环境，通过镜头角度的变化，为英雄人物选择有利的背景；就连威虎厅的那盆火，本来是在座山雕座位旁边的，但我们在拍摄座山雕的画面时，却有意地把它避开，而设法把它处理成杨子荣的后景，用来衬托英雄的高大形象。

我们体会到，要表现杨子荣压倒阶级敌人的英雄气概，一方面要爱英雄恨敌人，用各种手段在英雄和敌人之间形成对比，造成褒贬，显示高低；另一方面，在运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又要恰到好处，不能绝对化。在这里，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个问题：（1）既要表现舞台上英雄居中心、敌人靠边站的位置，又



不能不加选择地拍那种把所有人物都包括在内的大全景画面，而必须用景别和角度的变化去细腻地表现英雄人物；（2）既要表现英雄的高大形象，又不能只给英雄人物特写镜头，不拍摄他同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场面；（3）既要表现英雄同敌人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又不能不分敌我地谁有戏就把镜头给谁，以至宣扬敌人的反动气焰；（4）既要表现杨子荣在阴森的匪窟中进行斗争的环境，又不能因此而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

第三，努力烘托和渲染主要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这个问题，我们在摄制工作中也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在处理第一场杨子荣出场的镜头时，开始没有进行渲染，而是让他直接进入画面，结果显得很突然，没有力量，给人印象不深。于是又考虑在他“亮相”之前，先在远处的松林背后让他与申德华一起身披白披肩侧身急速闪过，想给人造成悬念，借以渲染，但实际上却使人感到故弄玄虚。后来我们反复研究了舞台上这一场戏的特定情景，确定了通过追剿队指战员急切盼望的表情来进行渲染，这就是：当吕宏业报告“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的时候，先拍参谋长翘首遥望，接着是战士们转身眺望，然后又是参谋长欣喜地远望，最后才是杨子荣在追剿队的同志们这种急切盼望的气氛中，迎风踏雪疾步而来，迅速跳成“亮相”的特写镜头。比较起来，这样可以使无产阶级英雄杨子荣给人留下较为鲜明的印象。同样，在拍摄小常宝诉苦的一段戏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主要英雄人物的烘托问题。戏虽然主要是小常宝的，但我们没有孤立地去表现小常宝，而是在关键之处给了杨子荣两个强烈反应镜头：一是当小常宝唱到“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时，出现了杨子荣无限同情而又悲愤填膺的镜头；二是当小常宝唱到“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岗”时，又出现了杨子荣握拳跨步的镜头。这样，既反映了小常宝的阶级仇恨和强烈的革命愿望，又表现了杨子荣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感到，烘托和渲染是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手段，但要运用得好，就必须在吃透和理解人物上、剧情上狠下功夫。我们为了烘托杨子荣日夜兼程奔赴威虎山的革命精神而设计第五场幕前表现景物、气氛的空镜头时，就反复研究了三、四、五、六场剧情的发展过程，根据杨子荣从指挥所出发到威虎山所经过的时间、路线，讨论了幕间音乐提供的音乐形象，最后才



设计出表现林海、雪原、月夜、晨曦等的一组空镜头。

在摄制《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人物造型和环境气氛等方面的处理上，如何做到既要高于现实生活又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既要符合现实生活又不能自然主义。过去在刘少奇、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下所拍摄的那些战争题材的片子，总是要把敌军官的服装搞得笔挺挺的，而把我军指战员的服装弄得窝窝囊囊的，这实际上是美化了敌人，丑化了自己。革命样板戏成功地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做到了既有鲜明的时代感，又符合历史真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我们在开始拍摄时，却既反映出自然主义的余毒，同时又暴露出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历史真实的问题。就拿为英雄人物提供环境来说，我们曾经错误地认为，如果在布景上做旧做破，就是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因此，不分解放前后，片面地追求整洁。这样做，既美化了旧社会，也不利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我们体会到，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必须努力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同时又必须不断地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进行艺术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达到上面的认识，取得较比正确的经验，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的。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优秀样板，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优秀样板，广大工农兵早就盼望着能够把它拍成电影。因此，当我们接受拍摄任务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同志们都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样板戏拍好。但是，由于过去我们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响，头脑中形成了许多旧框框，因此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摄制工作中片面地追求所谓“电影化”，几度走了弯路。

电影比舞台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少，一部故事片总要变换几十个甚至上百



个场景。为了适应电影的表现方法，我们曾经片面地追求场景的多变，把舞台演出的十个场景改变成了四十一个场景，结果破坏了舞台分场分幕的完整性。为了追求电影的衔接效果，我们曾错误地增加了许多情节，结果打乱了原舞台戏的结构，把样板戏搞得面目全非。为了追求电影的所谓形象化，我们在处理成套唱腔时曾滥用了回叙、“叠印”的技巧，结果离开了剧中的规定情景，割断了唱段的连贯性，妨害了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了追求电影画面的纵深感，我们曾不适当地套用了故事片的布景设计方法，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造成了繁琐堆砌，结果破坏了舞台布景的主体形象和演区，把剧中的人物冲淡、淹没了。

上面这些片面追求“电影化”的做法，都失败了。接着，在一部教学片的摄制工作中，我们又走了一段机械照搬的弯路。在拍摄这部片子时，我们以为既然是为了教学，让人家看了好学习舞台演出，那么只要把舞台演出的内容一点不漏、一点不变地拍摄下来，就达到目的了。但事实使我们认识到，电影不象舞台演出那样通过真人实物同观众直接交流，电影银幕又比舞台小得多，所以这样机械照搬拍下来的影片，看上去外貌上类似舞台演出，而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连人物的表情都看不清楚，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反映出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因此又失败了。

在第三次的拍摄工作中，由于我们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只是从形式上考虑问题，觉得电影手段使用得还不够，就进一步追求所谓“电影化”，结果又产生了正不压邪的错误。舞台上的第六场戏，杨子荣始终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位置，座山雕等匪徒是靠边站的。我们在拍摄时曾忽视了这一点，而把注意力放在镜头的调度和运用上。当杨子荣面对座山雕等匪徒的盘问、威胁进行斗争时，我们不分正反，谁有戏就把镜头给谁、表现谁，想以此来增强戏剧冲突，但实践的结果却是反面人物张牙舞爪，正面人物显得不突出了。

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教导我们的：“失败者成功之母”，“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在走过这些弯路以后，我们认识到，片面追求所谓“电影化”和机械照搬，都是因袭了过去拍摄电影那一套老框框的结果。这些老框框，是在拍摄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的旧戏过程中形成的，不适合革命样板戏的规律，今天原封不动地拿来套革命样板戏，必然要损害样板戏的革命精神，是根本行不通的。要完成拍摄革命样板戏这个光荣的任务，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我们电影



工作者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不断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砸烂电影的旧框框，大胆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走弯路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违背了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把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摆错了。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和林默涵、陈荒煤之流，在电影领域里大肆贩卖“离经叛道”等反动谬论，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旧北影变成了一个毒草丛生、鬼蜮泛滥的基地，也毒害了我们摄制组的一些同志。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要彻底肃清我们头脑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却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在这次摄制工作中受旧框框的束缚，单纯追求艺术效果，一度离开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就是这种余毒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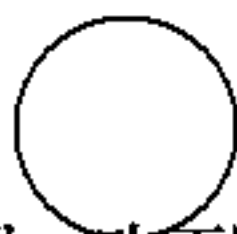
我们带着暴露出来的问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总结，找出失败的教训，并结合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大破电影的旧框框，确立电影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我们在总结走弯路的教训中才明白，问题不在于拍什么片种和使用什么艺术手段，而是必须坚决贯彻艺术为政治服务、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做到：怎么能拍好革命样板戏就怎么拍，怎么有利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怎么做。就这样，我们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砸烂了电影的旧框框，不断革命，在摄制工作中才逐步落实了江青同志关于“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重要指示，达到了现在的成果。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顾拍摄《智取威虎山》的工作中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感到在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中虽然有了一点进步，但问题还很多，差距还很大。今后，一定要在三大革命运动和艺术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不断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文艺革命，努力为我国无产阶级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怎样把斗、批、改不断引向深入

——吉林化工医院的调查报告



在斗、批、改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怎样继续前进，把斗、批、改不断引向深入？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单位，特别是一些运动进度较快的单位考虑的。

吉林化工医院通过自己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经验。

斗、批、改应当深入进行下去

吉林化工医院是一个有五百多工作人员的医院。革委会成立以后，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医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感到，斗、批、改的几个阶段都已经搞完，能做的都做了，该改的都改了，下一步怎么走，等一等再说。在这种“等一等”的思想的影响下，斗、批、改一度松了下来。

可是，事实并不象有些同志想的那样简单。就在这时，外科疗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把一位工人医生“轰”出医院去。这位工人医生是一个有十八年工龄的老工人，他怀着为无产阶级掌握医疗技术大权的雄心壮志，到医院举办的“工医班”学习。他边学习，边做政治工作，给医院的斗、批、改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但是，一个思想反动的家伙却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粗手笨脚的拿不了手术刀”，并且煽动贴大字报撵这位工人医生。

这件事，对全医院震动很大。医院革委会发动群众，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技术第一”、“专家办院”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教育了群众。他们结合这场斗争，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



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经过学习，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斗、批、改的长期性。在斗、批、改中产生的“满”字，实质上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余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这件事说明：集中地进行了一段斗、批、改，并不等于斗、批、改的完结，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有待于进一步肃清。如果不乘胜前进，就会半途而废，甚至会走回头路。因此，决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斗、批、改深入进行下去。

毛主席的指示是斗、批、改深入的方向

怎样把斗、批、改不断引向深入？化工医院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主动地发现和解决本单位斗、批、改中的问题，使斗、批、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有一段时间，由于医务人员减少，就诊病人增加，看病要排长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按科把门诊、病房、药局合了起来，改成“一条龙”。这样一改，走廊里长队没有了，诊室内的病人却很拥挤，“一条龙”变成了“一窝蜂”。工人送大字报批评说：“门诊大搬家，房子调一下，追求形式改，看病更复杂。”

医院的铁东分院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分院派人下厂下乡、对外开放之后，也出现了看病排长队的现象。分院领导小组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和“预防为主”的方针，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深入到工厂、街道中去，培养工人医生和街道卫生员，大搞群防群治。在几个月内，就诊病人从每天四百多人下降到二百多人。

医院革委会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和铁东分院的经验，认识到，铁东分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开展本单位的斗、批、改。他们在斗、批、改越来越深入，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不是知难而退，坐等上级指示，也不是随心所欲地盲目去改，而是带着斗、批、改深入中的问题，认真学



习、反复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找斗、批、改深入的关键和路子，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医院革委会推广了铁东分院的经验，使全医院很快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指示的热潮，增强了领导的自觉性，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斗、批、改运动越来越深入。他们坚持以五分之一的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广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一年来，他们培养了工人医生、赤脚医生、街道医生六百一十六人，和一大批卫生员，建立了四十四四个土药房。化工医院负责医疗的区域，常见病、多发病、职业病的治愈率大大提高，发病率大大降低。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整个斗、批、改运动规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化工医院革委会在实践中体会到，斗、批、改说到底，就是认真地切实地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斗、批、改不断深入的过程，就是沿着毛主席的指示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的过程。

革命大批判是斗、批、改深入的动力

化工医院革委会认为，斗、批、改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斗、批、改深入到本领域，必然会遇到许多业务和技术的问题。不能就业务论业务，就技术论技术，而必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把斗、批、改搞好。

化工医院过去是个“洋”气十足的医院，排斥中医、中药。在斗、批、改运动中，革委会发动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使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时，有的同志感到，局面已经打开了，当务之急是“立”，一度放松了革命大批判，着重去抓中西医技术上的交流，把中西医门诊搬在一起。结果，名为“结合”，实为两家，坐在一起，貌合神离。

针对这个问题，革委会同医务人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伟大教导，大家认识到：只有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领会毛主席



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落实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实行不实行中西医结合，不是技术之争，而是路线之争。路线问题解决了，技术问题和其他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革委会组织医务人员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指示，狠批刘少奇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洋奴哲学”。毛主席指示引路，革命大批判开路，使中西医在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下，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化工区，有些职业病危害着工人的身体健康，按照“洋”办法，长期不能解决。有一位眼科医生，坐在医院里研究化工职业病，十四年一事无成。化工厂有个车间的工人，眼患一种职业病，这个医生查阅了许多“洋”本本，也没有找到治疗办法。革委会有意识地安排他到车间，搜集工人同这种眼病作斗争的“土”办法，可是他总觉得“土”法治不了病。后来，他也得了这种眼病，用“洋”办法治，照样治不好。工人帮助他用“土”法治，效果很好。工人们和他一起，结合亲身体会，开展革命大批判，使他很受教育，他说：“头脑中的错误思想不肃清，群众中的‘土’办法就学不进，中西医结合的根子就扎不深。”他和工人一起，用科学方法对治眼病的“土方”进行分析和试验，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制成了新的眼药，为这种长期不能治疗的职业病，找到了有效的防治办法。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指引下，化工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已经和正在解决汞、苯、铬中毒等十三种主要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不用开刀，治愈了胆结石、肾结石等疾病；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也收到了显著效果。他们还办起了土药厂，生产一百多种中草药制剂。

化工医院革委会自觉地把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和革命大批判贯串于斗、批、改运动的全过程。他们的做法是：（一）每落实毛主席一项指示，就发动群众认真回顾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开展革命大批判，分清路线是非，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二）每进行一项改革，都结合医疗实践，从路线上弄清为什么破，为什么立，努力破到要害处，立在根本上；（三）在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时候，考虑到怎样渗透到业务领域里去；在进行医疗卫生领域里的改革的时候，紧紧掌握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使之和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联系起来；（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时，引导医务人员把自己摆进去，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政治觉悟，为巩固斗、批、改的成果，打下思想基础。

改造世界观是斗、批、改深入的落脚点

在医院斗、批、改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毛主席指示，学过了，执行起来，有时走样；批判过的旧东西，过了一阵，在新的条件下，又会出现；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了，时过不久，又有回生。革委会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左反复，右反复，归根到底反复在人的世界观上；千改万改，最根本的改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他们抓住典型事例进行教育，引导医务人员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去年春天，有个出生四个半月的小孩，患“先天性脑膜膨出症”并发脑积水。这种病，几个大医院的“专家”、“权威”都说是“不治之症”。化工医院把这个患儿收下了，并决心给她治好。但是，一位经治医生怕负责任，不敢突破洋框框，东拼西凑提出了一个手术方案。医院革委会否定了这个方案，组织医护人员，狠批了刘少奇的“洋奴哲学”、“技术第一”，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挥战斗，先后进行了十次“民主会诊”，提出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新方案，顺利地切下了肿瘤，用中药调整脑分泌，根治了脑积水。从这以后，一连成功地治愈了五十例。这时，有的同志感到，治这种病技术过了关，万无一失了。可是，就在治疗第五十一例的时候，效果不好。原因在哪里？革委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识到仍然是“技术第一”的思想作怪。革委会又组织医务人员，抓住“技术第一”在新条件下的表现，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了医务人员不断改造思想的自觉性。

化工医院革委会在斗、批、改中，坚持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放在首位，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把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作为长期的任务，深入、细致、扎实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医院革委会注意引导医务人员把学习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同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结合起来，把斗、批、改深入到世界观里去。一位患“上颌骨混合瘤”的贫农老大娘来医院治病，五官科一位医生没有接收。学习了“老



三篇”和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以后，他顶风冒雪，往返三百多里，把老大娘接了回来。老大娘患病四十八年，瘤子长得比鸡蛋还大，吃饭很困难，话也说不清。这位医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切下了瘤子，使老大娘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

医院革委会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改变思想感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一位内科医生，过去是“一心啃透心血管，捞个终身金饭碗”。现在他深入到化工厂一个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在研究某种职业病的防治措施中，他自己得了病，但他仍然坚持到底，终于找到了有效的防治办法。工人热情地把毛主席的光辉画像赠送给他，称赞他是“咱们工人的好医生”。

医院革委会领导成员在抓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中，注意把改造自己放在前头。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首先肃清自己头脑中的“刘毒”；组织下厂下乡，首先自己带头参加。革委会主任身患多种疾病，组织上为了照顾他，让他离职休养，他说：“共产党员活着就是要革命，活一分钟就要战斗六十秒。”他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在医院里坚持工作。因为劳累过度，曾经数次昏倒，每次醒来，总是继续战斗。他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带动了领导班子，影响着广大群众。被评为沈阳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吉林化工医院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使斗、批、改不断深入发展，成为省、市斗、批、改的先进典型。他们门向工农开，步向工农迈，心为工农想，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年来，全医院涌现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六十五名，有八位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个医院正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反骄破满，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吉林省革委会 调查组
吉林市革委会

